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揽延人才、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改变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用人体制,让更多的社会底层才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当然,历史上也有几次科举考试十分荒唐。

荒唐科举:秦桧之孙九月大中榜眼

一场“零录取率”的考试

公元746年,杜甫初到长安求官,当时唐玄宗正沉湎于盛世的繁华和温柔的富贵梦里,已经懒得亲自处理政事,把“外朝”交给李林甫,“内朝”交给高力士。第二年,杜甫等一大批当时杰出的才子参加玄宗为选拔人才而设的“制举”考试。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李林甫,他是当朝宰相,但却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张九龄、严挺之、贺知章、李邕、李适之、房琯等一大批杰出人物都受到了李林甫的迫害甚至暗杀。他尤其嫉恨因为文学才能而得到封赏进官的士人,结果参加“制举”考试的人,没有一个被录取。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对考试结果,他自己还向玄宗上表祝贺:天下贤士都在为国报效而没有遗漏,这是多么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啊!连尧舜明君都不能如此明察秋毫吧!参加那次考试受到愚弄的还有著名诗人高适和元结。

未满周岁考生也被录取

秦桧由于在绍兴议和卖国有功,先后把持朝政十九年之久,他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赵构,独掌朝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

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不但如此,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其年龄不到一岁(只有九个月)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他利用手中权力,任命其亲信御史中丞魏师逊、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吏部郎中权太常、少卿沈虚中、监察御史董德元、张士襄等人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于是,他们就串通作弊,准备录取秦埙为状元。后经人揭发,状元没有当成,但也高中榜眼。更有甚者,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其侄子秦焯、秦熿、姻亲沈兴杰、朋党周夔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

被全部推翻重考的会试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这次会试本来很顺利,但在发榜这天却发生骚乱。3月5日,是三年一次的“会试”放榜的日子。这天,黄榜一开,人群大哗。原来金榜上的所有高中举子都是南方人,连一个北方人也没有,这在科举考试中是非常罕见的。当时明王朝的首都是南京城,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

地拥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作出解释。朱元璋得知消息后,一边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一边找来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

经查实,本次考试并没有作弊,南方举子的考试成绩确实比北方举子的成绩好,考试成绩都属实。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是不会因私枉法的。但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朱元璋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没想到刘三吾拒绝更改成绩。

朱元璋听了大发雷霆,气得将刘三吾赶出京城,还把其他几位考官都撤了职,重新组织考试。这次由朱元璋亲自督考,主持复试的翰林院侍讲张信很不知趣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说北方试卷确实不如南方卷,原来考官绝无偏袒之事……朱元璋闻言顿时勃然大怒。他宣布,以前的结果一概无效,由自己亲自裁定。一个月后,复审结果宣布,这次朱元璋又走了极端,新入选的61名举子全部是北方人,一个南方的举子都没有。

(据《南京日报》)

康熙帝堪称“超级学霸”

康熙(公元1654—1722年),8岁继位,君临天下61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康熙好学,帝王中无人能敌,堪称“超级学霸”。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发明者)曾说过:康熙的求知欲强烈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受大清文武百官顶礼膜拜的君主帝王,竟可以同传教士每天三四个小时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样的相处,熟悉各类精密仪器,共同钻研各门学科的知识。教士们上完课离开,康熙竟意犹未尽,自己还反复复习授课内容,有时还会叫来几个皇子讲课给他们听。康熙当时请了西方的不少学者(当时叫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化学、药理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外语,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

多本。1780年,康熙组织西方专家学者,用了10年时间,绘制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科学水平最高的中国地图——《皇舆全览图》。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成果却被作为密件尘封在内务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当时经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宝贵的原始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很长时期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

康熙在学习之余,还组织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文》、《康熙字典》、《律历渊源》等书籍。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竹幄,读《易经》、览《尚书》,读《左传》、诵经诗,赋诗著文,日以为常。他不仅读书,还亲自动手演算习题,亲自撰写科学文集《几暇格物编》。令人惊奇的是,他还出版了自己的科学

论文《御制三角形推算论》。他不仅喜欢读书著文,还喜欢做试验,在宫里做化学试验、设实验室制药,推广用金鸡纳霜治疟疾和种牛痘以防天花(在皇子、宫女身上做实验)。更让人叫绝的是,他还在当时中南海丰泽园的一块稻田里,发现了一株高出众稻的成熟稻穗。于是他把这株早熟的稻穗摘下来,决定第二年再种,看它是否比别的稻子早熟。第二年试种的结果,还是比别的稻子早熟。从此,他便以此为种子,培育了新的杂交稻种。这种新稻种所产之米叫“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

康熙一生兢兢业业,把全部精力和学识、才能贡献于统一国家,捍卫主权,发展生产等方面,为中国社会前进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明君主。(据中国新闻网)

陈寅恪出高考“怪”题

据穆凤良、许建平的《译德载物:清华人文学者对中国翻译的贡献》记载,1932年,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为该校的高考国文试题出了一道作文题和一道怪题——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要求考生对出下联。

“孙行者”即《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家喻户晓、老少咸知,可让考生对对联,就有点难为这些中学生了。据说后来只有3位考生对上了,其中一位考生即今著名语言学家、北大中文系周祖谟教授。他们对的是“胡适之”,

“孙”对“胡”(猢猻),“行”对“适”,“者”对“之”,答案是胡适的名字,相当有趣,大大出乎陈寅恪的意料。

当时人们都认为陈寅恪是故意要调侃好友胡适之的。其实陈寅恪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清代训诂学家)或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根本就没有调侃胡适的意思。

陈寅恪出此题是为了考察学生的文字、声调、词汇、语法、文学等方面的国学水平。他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考察了“孙悟空”之所以叫“孙行

者”的民俗学原因:“印度的故事书《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传入中国,被南北朝的高僧僧佑改编为《出三藏记集》,吴承恩后来读到了此书。孙行者名字的来历,实为玄奘西天取经时,一个胡僧为之带路。胡僧与猢猻谐音,加之汉人好热闹,戏传为‘孙行者’。”

陈寅恪的出题说明:“对对子”包含了微观与宏观的文化,也蕴含了语言的共性与个性。难怪他出的这套汉语试卷题被清华大学采用了。

(据中新网)

钱穆为何称胡适“人格低下”

国学大师钱穆在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胡适一直与钱穆不睦,近读岳南先生的文章,始知究其根本,缘于二人的第一次见面。

钱穆未出道之前,一直在苏州中学执教,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就发生在苏州中学。有一天,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演讲,当时苏州东吴大学有一个叫陈天一的老师,向胡适推荐了钱穆,称如胡适到苏州中学,不可忘了见钱穆。

那天早上,胡适走上讲台,看到第一排坐着的钱穆,就邀请他到台上就座。当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书都是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钱穆一直没找到,便当面向胡适请教,但胡适也没回答上来,场面不免有些尴尬。

这就为日后二人不能和谐相处埋下了伏笔。据钱穆记载,因了这次尴尬,胡适午后就离开了苏州,钱穆因此反思道:“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后来,钱穆入北大历史系任教,与胡适的正面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二人关于老子出生时间问题,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的。胡适认为老子出生早于孔子,因为有孔子问学于老子为证;钱穆则认为老子出生晚于孔子。二人因此展开争论。据说在一次教授会上,二人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回答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二人还因谁的历史课讲得好而互相较劲,钱穆的侄子钱伟长曾在谈话中提及:“我的叔叔钱穆,是一位文史大师。他到北大讲历史,胡适看不上他,两人都讲中国通史,并且都出了教材,胡适讲的是理论,我叔叔讲的是史实,他二十四史史料很熟,故事讲的娓娓动听,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胡适终于没有讲过他。”

如果说上述论争属于学术范畴尚可理解的话,那么二人由此在对方人格上互相攻击,则就不可理喻了。钱穆认为胡适人格低下,内心阴暗,并举例证明:“胡适之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余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便,又不便坦言告尔。”据任继愈先生回忆,有一年,历史系主任休假,有人提议让钱穆来接替,文学院院长胡适说:“钱穆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经是教授了。”此提议只好不了了之。(据《工人日报》)